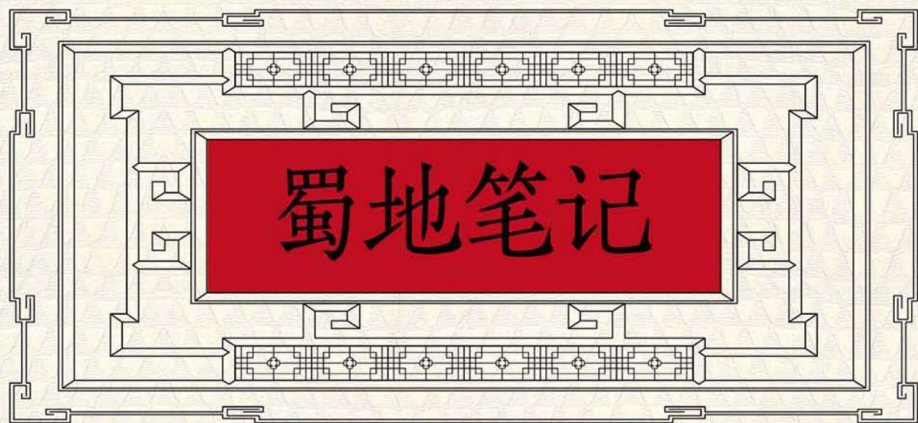




蒋蓝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蜀地笔记 / 蒋蓝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220-10558-6

I. ①蜀… II. ①蒋… III. ①人物—列传—四川
IV. ①K820.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8980号

SHUDI BIJI

蜀地笔记

蒋蓝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石 云
张 妮
戴雨虹
王鲁琴
许 茜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46mm×208mm
13.625
290千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10558-6
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作者简介



蒋蓝，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西部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四川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成都文学院终身特约作家。已出版《豹典》（2016）、《媚骨之书》（2015）、《樗枰之书》（2015）、《霜语》（2015）、《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2014）等多部文学、文化专著。多本著作入选年度中国好书榜。曾任《青年作家》月刊主笔、主编，现供职于媒体。

蒋蓝《蜀地笔记》的常数与变数

梁 昭

2016年夏天，在四川省图书馆报告厅参加蒋蓝的新书《豹典》分享会，听他滔滔不绝地展开关于中西动物诗学的比较论述，顿感耳目一新。除了佩服他的口才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从他的演讲中感到这是一位兼具学养和反思意识的作家。

之后的一年来，我陆陆续续地几乎把蒋蓝的作品读了个遍。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读完《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最后一页的那个冬日傍晚。那时我独自在家，从书上抬起头，走到阳台，看到天色已擦黑，心间浮起如同微茫的天光一样不可名状的恍惚之感。“踪迹史”利用残缺不全的史料书写了一部雄心勃勃的地方史，展示了由不辞辛劳的调研、细致入微的考辨和幽玄锋锐的笔法构建而成的令人目眩的历史断面。蒋蓝纵横捭阖、古今关联的叙述方式，让一个个被掩藏的历史踪迹得到清晰的呈现，同时由于这种呈现延展出无限繁复的细节、叠峦迷障一样的隐喻，所以仿佛又延伸出新的待解码的踪迹……这样的作品能极大地调动起读者的智力参与，让你对现实的根基重新发问。

蒋蓝早年写诗，近二十年专攻散文以及“非虚构写作”。



我比较喜欢从“非虚构”的角度去看待他的作品，不是因为这个词时髦，也不仅是因为他自己也认同这个概念并阐释了“非虚构”的“五大特征”，而是因为这个词契合他写作的特点：秉持现代价值立场构造语词秩序来烛照现实。以否定式来构词的“非虚构”表达了“虚构性”和“并非虚构”的相反相成。在蒋蓝这里，介入重大现实和营造文学幻象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证明并充实了“非虚构”的汉语意涵。从这个角度上看，他的全部作品仿佛一个察看、探究万物与众生的系统工程，每一部作品如同“纵目”之光打开的钻石切面一样，折射了整体的光芒。

《蜀地笔记》是一部表述四川古今文化的非虚构散文的结集，与他另一部《成都笔记》构成姊妹篇。标题有意沿袭前人，含蓄而有古意。——据蒋蓝考察，当代尚未有人使用这个具有突出标记性的短语来作为书名。“笔记”指的是活跃在汉语传统的一类实用性文体。据考，其名始于六朝，其作为独立之文体则兴于宋，是文人在“正统文章”之外，用以记录野史稗闻、学术杂考、日常随感的闲散“小”文。这类文体在古代是与“正经”“正统”“正史”一类公共写作相对的“私人写作”，虽为知识阶层的日常阅读对象，却因其随意性、繁杂性而长期被视为边缘文体。不过，由于现代社会对市民社会的重视和对个人价值的强调，反映了个人经验和多元价值观的笔记体获得了正当性，成为现代散文写作的主要形式。在我看来，宋人的随笔杂记表现出来的广博学识和游戏精神，与蒋蓝的气质和志趣十分相符。作为一名对汉语写作的历史传统情有独钟的作家，蒋蓝写下大量谈风俗、记风物、谈诗论艺的“笔记体”，体现出如宋人一般将

“文以载道”和“以文为戏”相协调的文化态度。到目前为止，他直接用“笔记”命名的作品就有三部：《极端动物笔记》《极端植物笔记》《极端人物笔记》。另有一部荣获成都文学院优秀作品特等奖的《豹典》，虽用代表公文体制和法则的“典”来命名，其中的文章也是长短不一的笔记体。这些文集各有一个宽泛的主题，文章的组合却是去中心的。具体行文由诸多知识和掌故构成，以诗性联想织成串线，读起来趣味横生。

就《蜀地笔记》而言，“笔记”与“蜀地”相连，还昭示了一个地方性的书写传统。在中国，大一统格局与地方意识很早就辩证地统一在文化观念里。所谓“地方”以及“蜀地”之“地”，固有“一方水土”之地理范围之意，也有相对于“中央”的“四方”之意。各地的文化多样性历来受到权力中心的关注。《礼记·王制篇》阐述了自然地理的差异对各地文化的影响；《史记》的“列传”承续《礼记·王制篇》以方位视角来区分各地人群文化的地方观，形塑了汉代及其后的一整套史家的地方书写传统。就地方的角度而言，中国现存第一部、体例最完整的《华阳国志》，恰为记叙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的方志。其中除了关注西南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外，尤可注意者是还记载了许多官方史书阙如的地方传说。之后，自宋、元、明、清至民国，四川的方志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他关于蜀地的诗文篇章更是数不胜数。如此数量众多的地方书写，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以来蜀人的文化自觉，也形塑了外人和蜀人对于“蜀地”的认知观念。

这样看来，“蜀地”既是一个客观的地理区域，又是由历



代书写形塑的表述单位。蒋蓝的《蜀地笔记》参与了这一书写传统。在第一篇可视为全书总纲的《历史谱系中的“巴蜀定律”》一文的第一段，蒋蓝写道：“在国人印象中，巴蜀人多地少，环境挤压出来的精明和强悍，促使巴与蜀成为‘最自以为是’和‘最擅长单打独斗’的代表；自然地理的特殊封闭，又使群山环抱的蜀地与黄河文化隔山而立，且巴地又与婉约的江南文化隔江而望，三足鼎立的巴蜀文化格局在先秦时代即已形成。”这里总结的“巴蜀特性”是不是客观事实呢？蒋蓝用一个短语“在国人印象中”轻轻一提，点明这种“事实”乃是来自普遍的、同时也略显刻板化的共识观念。他承认这种事实有一定依据，但又强调历史有一定的“变数和常数”。接下来，他讲述了三个“成王败寇”的典故和一个政权强制修正风俗的故事，隐喻关于历史的规律在于人心。紧接着是一大段洋洋洒洒的“蒋蓝式”论述：

“我心中的‘巴蜀定律’，意味着巴与蜀是历史性的、有关联的、有问题的、具有风格化矛盾的一个有机整体。地缘文化的转向从来不会从主流主义的角度，被刻意解释为对一个新的文化体系的惊人发现，而至多是被当事人看作是反映一种根本的价值冲突和与社会经验对立的问题系统，它是某种涌动的、坚实的、未被制式化的活力。”

这段议论例证了何为富有思想性的“非虚构写作”。《蜀地笔记》不是一个蜀人对本地文化之光辉灿烂的证明，也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毋宁说，它把看似具有连续性的“蜀地”视为一

个假说，一个待商榷的问题，把前人和他者的言说变为探讨的空间，用自己的观察和书写去挑战主流的观点，以此对有代表性的地方象征进行解码和再次编码。“自适其适”的“笔记”在这里被发扬成为具有独立批判性的写作立场。

《蜀地笔记》凡五十篇，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蜀桫欂外传”大致可视为历史记录、历史补遗。“桫欂”据传为古代“嚣凶之恶”，另一说为伐木留下的缠绕年轮的树桩；原为楚国史书名，后有四川新津人唐英拟为书名《蜀桫欂》，比喻为可以警戒后人的历史。蒋蓝选择这个冷僻的词语作为编名，显示了他偏好的另类史观。本编文章涉及自然地理（武担山、巴蜀江河）、地标景观（都江堰）、人工器物（李冰石像、汉碑、雕版印刷的经文）等，均与古史相关。中编“蜀轸流转”由二十六篇风物考辨的文章组成，写的是蜀地传说中或现实里的动物或植物。“蜀轸”是蜀琴的另一种说法，显然蒋蓝用代表蜀地文化的器物之一——古琴来比喻四川的风物。下编“蜀中广记别裁”沿用明代地志《蜀中广记》的名称，“别裁”表明作者新的调查和写作。这部分涉及四川的文化遗产（龚扇、蜀绣）、名胜古迹（飞仙阁、科甲巷、峨眉山、自贡的燊海井、淮盐巷、盐分巷、薛涛墓地、五峰山、陈子昂墓园）和神话传说（盐水女神）。与上编的篇章相比，这部分的历史书写，更多地来自作者自身的采访、调查和经历。

在我看来，蒋蓝的写作堪称文学人类学式的书写。“文学人类学”是近三十年来由国内一批兼具文学背景和人类学知识背景的学者倡导的新兴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在方法上，它主张采



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来研究文化行为和文化符号；在材料运用上，文学人类学学者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发展至“四重证据法”——利用文字（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口传、出土器物及图像来研究上古文明，探究华夏文明的起源问题。

具有博雅治学志趣的蒋蓝的书写模式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有异趣同旨之妙。他常年奔走于山河大地，用“文学田野调查”的方式来观风察俗、辨名析物。他在折叠了历史踪迹的田野现场耐心发掘，体察万物，将史籍里明示的和隐蔽的部分都复原为鲜活的见证，更用从未被展示过的地方性知识来填补人们认知中的空白。例如在四川瓦屋山求证神兽角端、食盐兽（牛羚），在峨眉山种植桂树，观察髭蟾、峨眉猴、雪精石、雪蚕、枯叶蝶……从数不胜数的地方“冷僻知识”中可见蒋蓝阅读的踪迹，更可见其行走和思考的踪迹。他将有字之书和无言的大地放在一起阅读，获取了新鲜的、永不衰竭的知识动力。他的奔走、他的在场，更使得客观、冷静的知识生动起来，与感性的现实交织成为相互指涉的语义之网。

蒋蓝在写作中常常穷尽书写对象的各种材料类型，表现出高明的材料驾驭能力与穷究事理的热情。在一篇文章里，古今中外的史书材料、诗文的引用自不必说，其他如文学人类学学者倡导的民间口头叙事、考古出土的化石和器物、图片（史籍中流传的和自己拍摄的）等也大量出现。如《蜀地笔记》里探讨古史的“上编”，每一篇章都运用了两种或三种以上类型的材料。他试图凭借大象的化石、出土的古文字、李冰石像、汉碑等器物，去叙述一个与中原华夏文明既有纠葛、又相对独立的“古蜀文明”——一个“逸出黄河文明一块‘想象’的飞地”（《想象之

象——古蜀与大象》)。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性的探究在蒋蓝这里非但没有减损文学性，反而生长出一种独特的根植于绵密事理之上的磅礴诗意。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成都武担山石头记》一文。这篇文章引用古人和今人（包括“洋人”）的史记和见闻，考辨古蜀开明王设立的武担山及山上的石镜传说。然而在考证过程中，他不断抛出对材料的分析、联想，从该传说系列引申出关于权力、爱情、死亡与永生的讨论。在这里，蒋蓝让“历史”承担了文学的功能：传说或真假难辨，但与武担山相关石头、石镜在汉语书写传统中真实地延续这一“事实”，传达着人们的某种永恒的和危险的渴望。所以蒋蓝的诗性是这样出场的：让历史叙事各就各位之后，他的隐喻和象征从罅隙喷涌而出，从而又引震了更多的幽暗深渊。

写到这里，我想到，对于一个富有创造力和自省意识的作家而言，用任何一种“传统”去理解他都是不全面的。固然我们可以把《蜀地笔记》《成都笔记》等文体放在地方书写、文人笔记等历史中去解读，但这并不代表着蒋蓝的作品仅仅是传统书写的沿袭。实际上，面对他的作品，我常常想起的，是西方中世纪那种将科学与玄学合二为一的思维方式。理性和想象都是有限的人生把握无限的凭借，两者的交织足以展示一种精微的、纯粹的、令人心旌神摇的新图景。这样的文字把时间变成了乐器，一切在历史中流淌的都奏出了令人惊叹的乐音……

目 录



○—— 上编 蜀桷杌外传 ——○

- 历史谱系中的“巴蜀定律” / 003
- 想象之象：古蜀大象踪迹 / 008
- 成都武担山石头记 / 016
- 巴蜀图语：等待破解的远古密码 / 028
- 天府广场石犀：彰显秦汉成都城市文明 / 041
- 都江堰李冰石像：遥看江源文明 / 053
- 天府广场汉碑：中国最早地方官学的物证 / 065
- 陀罗尼经咒：中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 / 076
- 大西政权的科举考试 / 086



—— 中编 蜀轶流转 ——

- 食火兽与火浣布 / 099
- 食虎兽多面像 / 105
- 瓦屋山角端记 / 112
- 开明兽变像 / 122
- 望帝托杜鹃 / 130
- 豹与华南虎在四川的消匿史 / 139
- 巍巍自贡市，天然一宝地 / 146
- 成都的桐花凤 / 157
- 鲤鱼是仙人的坐骑 / 162
- 蜀地丰瑞花：去兮归来记 / 165
- 蜀葵的踪迹 / 174
- 蜀地银杏轶事 / 180
- 作为植物的“蒋蓝” / 187
- 西南地区拐枣的流变史 / 197
- 天彭牡丹的蜀性 / 203
- 成都的桫欏 / 211
- 蜀汉南中与“救军粮” / 219
- 木中王者桂树的阴面和阳面 / 226
- 从中国彩砚到芭茅草 / 234
- 灯草以及灯草客 / 243
- 天地感应与花鸟异事 / 249

花蕊夫人轶事与蜀地修辞 / 257

龟城之龟甲下落 / 269

蜀人嗜好香气 / 272

蚕马与蚕神 / 276

从文化口红到抹嘴肉 / 280

○—— 下编 蜀中广记别裁 ——○

今有蜀绣惊海内 / 285

龚扇的蝉翼 / 292

蒲江飞仙阁：西南丝路上的佛国 / 302

科甲巷传奇 / 313

峨眉山笔记 / 345

盐水女神、廪君及其变形记 / 376

燊海井的历史经线 / 385

淮盐巷、盐分巷与异托邦 / 396

关于薛涛墓地 / 403

五峰山的拔节之声 / 406

如何定位和命名蒋蓝的写作 / 410

后 记 / 416

上编

蜀梼杌外传



《蜀梼杌》为宋代唐英撰。盖取楚史之名，以为记恶之戒，非徒衍其小说，亦使乱臣贼子观而恐惧云耳。唐英字次功，自号黄松子，蜀州新津人。“梼杌”也是历史的一个隐喻。

历史谱系中的“巴蜀定律”

定律是为历史实践和事实所证明、反映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的论断。但定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变数和常数来调节定律的生命周期。在国人印象中，巴蜀人多地少，环境挤压出来的精明和强悍，促使巴与蜀成为“最自以为是”和“最擅长单打独斗”的代表；自然地理的特殊封闭，又使群山环抱的蜀地与黄河文化隔山而立，且巴地又与婉约的江南文化隔江而望，三足鼎立的巴蜀文化格局在先秦时代即已形成。一方面在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使蜀地盆地意识具有惊人的同化性；另一方面四川俗语早有“出川为龙，在川为虫”一说，昭示了巴蜀人杰走出夔门天地一宽的大地出路。

他者“入川”的道路则充满危机。在巴蜀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头颅搬运事件”。一个是黄巢。884年黄巢在泰山虎狼谷兵败，被外甥林言砍下头颅，用黄锻锦盒把黄巢等人的脑袋泡上水银，遣人飞速送往“临幸”成都的唐僖宗报捷。成都，成了黄巢的归宿地。还有一个，那是翼王石达开。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科甲巷遭受120刀凌迟后，头颅连同奏



章经巴县水路送至湖北时，因头颅腐烂，最后被丢弃长江。而搬运中最著名的头颅，是张飞的头，那个大如斗的头颅。张飞在巴地阆中被部将范疆、张达暗害，二人取其首级投奔东吴。行至云阳，闻说吴蜀讲和，便将其首级抛弃江中，为一渔翁打捞上岸，埋葬于飞凤山麓。三个著名的头颅，昭示了巴蜀遍布的荆棘与凶险。

我心中的“巴蜀定律”，意味着巴与蜀是历史性的、有关联的、有问题的、具有风格化矛盾的一个有机整体。地缘文化的转向从来不会从主流主义的角度，被刻意解释为对一个新的文化体系的惊人发现，而至多是被当事人看作是反映一种根本的价值冲突和与社会经验对立的问题系统，它是某种涌动的、坚实的、未被制式化的活力。隔山而立的文化概念无法处置它，隔江而望的文化风景无法软化它，它便逐渐发展出了一整套不断更新的、自成系统的“最中国”的问题。于是，“巴蜀定律”就意味着巴蜀人还存在不少思想的疑惑与生活的难度，而这些疑惑和难度则是在地缘根性的驱动下，可以得到不断解决和完善。

如果说“鲶鱼效应”可以放之四海，那么，四川人则向世界举起了一条神奇的“蜀”——良者驯化为蚕，劣者蜕变为害；重庆人则一再向世界展示巴蛇气吞山河的麤君雄心。

蜀国的岷山与巴国的巫山成为两地的文化地标之后，它们的分野却是如此泾渭分明：这是一个拥有成都——4500年以上城市文明史、3000年城址未迁史、2500余年城名不变史的四川成都，巴国却在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五易其都；当蜀王们目